

第一章 先秦教育文献

一、中国教育文献的产生

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，这和中国历来重视教育有密切的关系。源远流长的中国教育史几乎是与中国的文明史同步发展的，所以，中国教育与中国历史都以先秦为发端，我国教育文献的源头也在先秦。

先秦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原始社会时期，由于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的低下，使教育也处于原始的水平。当时的教育尚未成为专门的和独立的社会活动，只是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，通过口耳相传和模仿，把生产和生活经验以及初步的道德规范代代相传。由于原始社会尚未有文字出现，因而也不可能产生教育文献。

大约到公元前 21 世纪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我国历史进入奴隶制时期。在夏、商、西周三个奴隶制朝代中，文化教育有了重大突破：文字产生了，教育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母体中独立出来，出现专门的教育机构。这两大突破使文献记载和流传成为可能，也使教育从无计划无系统的活动转为有计划有系统的事业。

但是，在奴隶制社会，奴隶主阶级垄断了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，同时也垄断了文化教育。在教育领域，实行“学在官府”制度，

由官府完全控制教育事业，官员身兼教职，即所谓官师合一。同时教育有严格的等级，高质量的教育成为天子的子弟和贵族子弟（“国子”）所享受的特权，普通平民只能接受社会教化。这种教育的等级性鲜明地反映在《尚书》、《周礼》、《诗经》等文献中。当然，夏、商、西周贵族教育在内容和方法上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。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的“六艺”之教是这一时期教育突出成果，它包含了文武并重、知能兼求的优点，对后世教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。而周公总结前代经验提出的“敬德保民”等德育思想，也成为儒家德育的重要理论渊源之一。六艺教育和周公的德育思想在《尚书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等文献中有详细记载。

大约在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前 221 年，我国处于春秋战国的大变革时期。随着铁农具的出现、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，奴隶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“井田”制被打破了，私田大量出现，东周天子的政治控制力衰落，诸侯并起，战事频繁，礼崩乐坏，官学没落，私学兴起。在政治、哲学、教育等领域都形成多元化格局。其中，在教育方面私学的兴起是一个重大进步，标志着教育独立性的真正形成。私学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，还形成了各自的学派，有力地促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。

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出现了一批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地位的大思想家，其中孔子、老子、管子、墨子分别为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墨家的创始人。

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儒家者流，盖出于司徒之官，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。”该学派的特点是注重六经，留意于仁义，尊崇尧舜文武。

“道家者流，盖出于史官，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，然后知秉要执本，清虚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，此人君南面之术也。”

“法家者流，盖出于理官，信赏必罚，以辅礼制。”

“墨家者流 盖出于清庙之守。”该学派以贵俭、兼爱、上贤、右鬼为主要特点。

此外，名家、阴阳家、兵家等都提出了各自的主张。各家相互争辩又互相吸收，在战国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。各学派大多有自己的私学，在传输知识中又积累了自己的教育经验，百家争鸣在一定程度上是教育思想的争鸣。在诸子的著述中也保存了丰富的教育内容。

综观先秦教育发展，“学在官府”和私学教育是这一时期两个重要阶段。教育文献也主要产生于这两个阶段，文献包括儒家《五经》和诸子两大类典籍，具体反映当时教育发展状况和思想水平。

二、《五经》中的教育文献

《五经》即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五部儒家经典。《五经》之称始于汉武帝时。西汉刘歆把古书分为七略，把这五部书以及后来已亡佚的《乐经》归于六艺类。东汉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沿袭了这种分类方法。在六艺的序中说明了把这几部经典归在一起的理由：“六艺之文：《乐》以和神 仁之表也；《诗》以正言 义之用也；《礼》以明体 阴者著见 故无训也；《书》以广听 知之术也；《春秋》以断事 信之符也。五者 盖五常之道 相须而备 而《易》为之原。”可见汉人是把这几部书作为互相有联系的一类书归类的。

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最大的经典，它们成为历代基本的教科书，其中的教育思想也成为儒家思想的源头。

《诗经》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，本只称《诗》，编成于春秋时代 共 305 篇，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 500 年间中原广大地区的社会生活。全书分为“风”、“雅”、“颂”三大部分。“风”含十五个诸侯国或地区的民歌，“雅”有“正”的意思 指王畿的正声 多

为宫廷乐歌有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两种。“颂”有《周颂》、《商颂》、《鲁颂》三种，是宗庙祭祀之歌，多为怀念先祖、歌颂先祖功德的赞歌。

作为一部诗集，《诗经》对古代教育的贡献固然不在于系统阐述教育主张，而在于部分诗歌中包含有关教育的格言警句，反映当时人们重视教育和求贤、修身的思想倾向。全书涉及教育的内容有以下几种：

其一，教育格言。如《卫风·淇奥》中的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，《小雅·鹤鸣》中的“他山之石，可以为错”；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”。说明学习不能孤陋寡闻，必须广交朋友，互相学习启发。历代一直在引用这些格言。

其二，反映重视人才和教育的思想。如《小雅·菁菁者莪》是一首歌颂君王能乐育人才的诗歌，《诗序》说：“君子能长育人材，则天下喜乐之矣。”后人论教育常以“菁莪”比喻教育人才。《大雅·棫朴》，《诗序》说是歌颂周王“能官人”即善于选拔人才。后人常以“棫朴”指代人才。类似的还有《大雅·卷阿》、《大雅·烝民》。前者据《诗序》说为召康公教戒成王求贤用士，后一首为尹吉甫赞美宣王任贤使能，中兴周室。

其三，提倡以身作则。如《大雅·思齐》：“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家邦。”

其四，歌颂重教育、兴教化的行为。如《鲁颂·泮水》就是一首歌颂鲁僖公修诸侯学校泮宫，推行教化的诗。诗中颂道：“明明鲁侯，克明其德。既作泮宫，淮夷攸服。”孔颖达疏曰：“僖公能修其宫，又修其化”；“至于克服淮夷，恶人感化，皆修泮宫所致”。

《诗经》有代表性的注疏本，有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、朱熹《诗集传》、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、王先谦《诗三家义集疏》等。

《尚书》如果说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，那么《尚书》则是我国最早的官方政治文件总集。它所记载的时代，上起唐虞，

下至春秋前期，为时至少有一千三百多年。记述了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等人的治国主张和措施。

《尚书》在西汉初存二十八篇即《今文尚书》。另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 汉武帝末年在孔子住宅墙壁中发现《古文尚书》较《今文尚书》多十六篇，其中《九共》一篇分之则为九篇，所以亦云多二十四篇。该书至西晋永嘉年间亡佚。东晋元帝时，有豫章内史梅颐献《古文尚书》五十八篇，其中为《今文尚书》加上伪撰的二十五篇。唐代的《五经正义》其《尚书》就用了这个今文和古文《尚书》的合编本。清代《十三经注疏》也如此。但根据自宋代到清代学者的反复考证，已经确定《古文尚书》二十五篇为伪书。《今文尚书》经学者考订大致可靠 其篇目为：《尧典》（包括《舜典》）、《皋陶谟》、《禹贡》、《甘誓》、《汤誓》、《盘庚》、《高宗彤日》、《西伯勘黎》、《微子》、《牧誓》、《洪范》、《金縢》、《大诰》、《康诰》、《酒诰》、《梓材》、《召诰》、《洛诰》、《多士》、《无逸》、《君奭》、《多方》、《立政》、《顾命》、《费誓》、《吕刑》、《文侯之命》、《秦誓》。

《尚书》中有关教育的文献，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在《舜典》中反映了原始社会后期教育的情况。如氏族首领对子弟的教育：“教胥子，直而温，宽而栗，刚而无虐，简而无傲。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，八音克谐，无相夺伦，神人以和。”短短几句，把对子弟的培养要求和诗、音乐等教育内容讲得很清楚。在同一篇中又有当时社会教化的记载：“帝曰：契，百姓不亲，五品不逊。汝作司徒，敬敷五教，在宽。”所说的五品，据孔颖达疏，即品秩，“一家之内尊卑之差，即父母兄弟子是也”。五教就是教以“义、慈、友、恭、孝”。在《周书·武成》中也提出“重民五教”的主张。从中可以看到后来儒家的“五常”的理论渊源。

在《周书》中反映了西周特别是周公的德育思想。周公总结和商的灭亡教训，提出“敬德保民”主张，强调“人无于水鉴，当于民

鉴”，统治者必须体恤百姓稼穡之艰难，做到“无逸”，“不敢侮鳏寡”，这样才能长治久安。

周公等提出的德材兼备人才观。在《周书·立政》中详细提出“九德”的人才标准，强调任人唯贤。在《周书·武成》中进一步设计了“建官惟贤，位事惟能，重民五教，惟食丧祭，惇信明义，崇德报功，垂拱而天下治”的治国模式。这是一个以德材兼备者任官和重视教化相结合的典型德治模式。

《尚书》的代表性注疏本有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《尚书注疏》其中孔颖达的疏可以帮助理解文意；还有清孙星衍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等。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有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点校本。

《周易》十二篇是古代一部占卜的书，包括《经》、《传》两大部分。《经》中有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，各有卦辞和爻辞说明卦和爻的意思，作为占卜之用。相传伏羲画卦，文王作辞。其萌芽可能在商周之际。《传》是对《经》的最早解释，包括解释卦的“彖传”解释卦意和爻辞的“象传”解释《乾》《坤》的“文言”以及解释通篇《周易》的“系辞”“说卦”“序卦”“杂卦”。《传》有十篇，统称为《十翼》，旧传孔子所作，但据近人研究，大抵是战国或秦汉之际儒家所作，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。

《周易》通过象征天、地、雷、风、水、火、山、泽的八卦，推测社会和自然变化，提出了朴素的辩证思想。在教育领域也有较深刻的理论思考：

提倡德智双修的自我提高。书中常以“君子”作为理想人格，提出君子的修养方式。如《乾》的《文言》曰：“君子学以聚之，问以辩之，宽以居之，仁以行之。”这是后来儒家提倡的“学、问、思、辩、行”的思想雏形。《周易》中许多有关进德修业的话已成为儒家修养的基本主张。如《坤·文言》中提出有名的“君子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”。这是儒家特别是宋代理学家最为注重的修养方式。又如

《蹇·象》：“山上有水 蹇。君子以反身修德。”孔颖达解释说：“蹇难之时，未可以进，惟宜反求诸身，自修其德，道成德立，方能济险。”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也是儒家修养的基本特点之一。有的成为代代相传的格言，如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（《乾·象》）；“君子以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”（《益·象》）；“善不积不足以成名 恶不积不足以灭身”（《系辞下》）等等。

《蒙》中提出“蒙以养正 圣功也”。孔颖达解释为：“能以蒙昧隐默自养正道，乃成至圣之功。”说明儿童必须从小接受正面教育，打好基础，才能健康成长。“蒙以养正”的观点已成为我国儿童教育的基本观点。

《家人》中提出一系列家庭教育主张。如家庭成员的定位：“家人 女正位乎内 男正位乎外 男女正 天地之大义也。”每个家庭成员都要履行自己的职责。强调严于家教：“家人有严君焉，父母之谓也。”但要严而有度 家庭中还须“交相爱也”“互相敬重。”“威如之吉，反身之谓也”。孔颖达解释为：“反身之谓者，身得人敬者则敬于人，明知身敬于人，人亦敬己，反之于身则施之于人。”也就是说家长也须设身处地为家人着想。

《周易》有代表性的注释本，有魏王弼、韩康伯的注本，唐孔颖达正义 刊于清《十三经注疏》 唐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 有《四库全书》本 宋朱熹《周易本义》 以及高亨《周易古经今注》、李镜池《周易探源》等。

《周礼》与《礼记》《礼》有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三种 其中《周礼》和《礼记》包含较多教育文献。

《周礼》本名《周官》，凡六篇，内容大致综合从西周到春秋的王室和诸侯国的官制，同时也包含一些儒家大一统思想。其中详细记载西周社会教化与贵族子弟教育制度。

西周的社会教化制度 载于《地官》 包括《大司徒》、《小司徒》、

《乡大夫》等。具体教法：大司徒在正月的吉日“布教于邦国都鄙，乃县教象之法于象魏，使万民观教象”。然后通过小司徒、乡师、州长、旅师等地方官员逐层往下传达，最后传到闾胥（二十五家为一闾）；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”。

教化的内容《大司徒》中说对百姓施以十二教：敬、让、亲、和、辨等、安、中、恤、节、能、爵、禄。并以“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：一曰六德：知、仁、圣、义、忠、和；二曰六行：孝、友、睦、姻、任、恤；三曰六艺：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”。同时“以乡八刑纠万民：一曰不孝之刑，二曰不睦之刑，三曰不姻之刑，四曰不弟之刑，五曰不任之刑，六曰不恤之刑，七曰造言之刑，八曰乱民之刑”。

贵族子弟教育制度载于《地官》的《师氏》、《保氏》、《乐师》、《大师》、《小师》等篇之中。其特点是有专人分工负责，有系统的教学计划。如师氏“以三德教国子”，保氏“养国子以道，乃教六艺”，乐师“掌教国学之政，以教国子小舞”，大师“教六诗：曰风，曰赋，曰比，曰雅，曰颂”；以六德为之本，以六律为之音”。而国子修德学道，有固定的课程和内容：“春合诸学，秋合诸射。”（《夏官·司马下》）

《夏官·大司马》中还有西周军事教育的文献，按中春、中夏、中秋、中冬四个季节，对将士开展不同的军事教育训练，也颇值得重视。

《周礼》的注疏有唐贾公彦《周礼注疏》（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），清孙诒让著《周礼正义》，王文锦、陈玉霞点校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。

《礼记》亦称《小戴礼记》，四十九篇，为秦汉以前儒家各种礼仪论著的汇编，西汉今文经学家戴圣编。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：“汉初，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，时亦无传之者。至刘向考校经籍，检得一百三十篇，向因第而叙之。而又得《明堂阴阳记》三十三篇……凡五种，合二百十四篇。戴德删其烦

重，合而记之，为八十五篇，谓之《大戴记》。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，为四十六篇，谓《小戴记》。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。融又定《月令》一篇、《明堂位》一篇、《乐记》一篇，合四十九篇。而郑玄受业于融，又为之注。《礼记》虽成书较晚，但其中多存儒家旧籍，并可考知先秦典章制度。书中还蕴涵丰富的教育文献，概括起来，大致有以下几种：

《王制》篇中包含西周学校制度文献。如“天子命之教，然后为学。小学在公宫南之左，大学在郊。天子曰辟雍，诸侯曰泮宫”。当时学校除了有教育的功能外，还有养老和作为天子举行出征等典礼场所的功能。这些都在《王制》中有记载。

《王制》中还有西周选拔人才的详细记载。负责选士的是大司徒，方法是从最基层的乡开始，层层选拔人才。人才分为秀士、俊士、造士、进士四级：“命乡论秀士，升之司徒，曰选士。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，曰俊士。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，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，曰造士。……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，而升诸司马，曰进士。”大学教育虽主要面向王太子、王子、卿大夫的长子等贵族，但从乡里选拔上来的造士也能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。

《文王世子》记载贵族教育的具体内容、方法与制度。统治者的长子“世子”其教育专人负责。立有大傅、少傅以养之：“大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，少傅奉世子以观大傅之德行而审喻之。大傅在前，少傅在后。”此外还置师保以教之：“师也者，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。保也者，慎其身以辅翼之，而归诸道者也。”有小乐正、大乐正等教以音乐、舞蹈等。设置众多教师的目的是，为使世子在生活中时时处处受到正面教育，随时可以请业受教。教育内容以礼乐为主：“凡三王教世子，必以礼乐。乐所以修内也，礼所以修外也。礼乐交错于中，发形于外，是故其成也悖，恭敬而温文。”道德教育是贵族子弟教育最重要的内容，因为作为统治者接班人的贵

族子弟是否有德，关系将来国家是否长治久安的大事：“君子曰：‘德 德成而教尊 教尊而官正 官正而国治。’君之谓也。”在具体教学上 按季节的不同 有固定的教学内容 春诵 夏弦 秋学礼 冬读书。在该篇中还有周公亲自教育武王世子的生动事例。

《内则》和《曲礼》中有许多儿童早期教育的内容，包括女子早期教育。其教育特点是注重礼仪和正确生活习惯的培养。

《礼记》中，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和《学记》、《乐记》诸篇是历来受到人们高度重视的论教育的篇章。

《大学》是儒家专论大学教育的文章，文中把“明明德”、“亲民”、“止于至善”作为大学教育的三个目标。并提出从自我的修身开始，推己及人，以至于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修养步骤，这是实现其教育目标的具体途径。在《中庸》里，阐述了学习的五个步骤：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其中提出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。当然，书中的行仅是指实践各项道德规范。朱熹曾将此五个学习步骤称为为学之序，写入白鹿洞书院学规，成为学者治学的基本方法。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还经朱熹的编订和注解，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一起编入《四书》中，成为宋以后学校教育的基本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本，影响深远。

《学记》是战国后期思孟学派的教育学特别是教学论著，它以精练的语言 阐述了教育的目的和对社会的作用：“建国君民”；“化民成俗”教育对受教育者的作用：“玉不琢 不成器。人不学 不知道”教育对教师的作用：“教然后知困”“教学相长”大学学制和教学管理制度 预（预防）时（及时）孙（循序渐进）摩（互相观摩）的教学原则；课堂内外相配合：“大学之教也，时教必有正业，退习必有居学。”课堂外的居学，具有观摩、练习等重要作用，成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深化；强调启发教学：“故君子之教，喻也，道而弗牵，强而弗抑，开而弗达。”对教师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，在语言上，要

能“约而达（言简意赅）”“微而藏（言不峻而明了）”“能博喻”教学上要善问善答，长善救失。因此，光有书本知识还不够，还必须了解学生和学习的规律：“记问之学，不足为人师，必也其听语乎。”也就是说，要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讲解和引导。《学记》是中国古代也是至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较系统的教育学论著，在中国和世界古代教育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《乐记》是专谈音乐理论和音乐教育的文章。文中把音乐与政治、伦理和礼紧密联系起来，认为音乐是人心感于外物而产生的，人心受外物刺激而产生不同的声音，如果配以乐器，就形成“乐”。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音乐，因此，音乐与时事政治是相通的，并反作用于政治：“凡音者，生人心者也。情动于中，故形于声，声成文，谓之音。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，其政和；乱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声音之道，与政通矣。”《乐记》中还详细探讨了音乐与礼的关系，认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：“乐者，天地之和也。礼者，天地之序也。和故万物皆化，序故群物皆别。”“乐至则无怨，礼至则不争，揖让而治天下者，礼乐之谓也。”正因为礼乐在治国中有如此重要的意义，所以文中说：“是以先王之制礼乐也，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，将以教民平好恶，而反人道之正也。”音乐教育的终极目标，是移风易俗：“乐也者，圣人之所乐也，而可以善民心，其感人深，其移风易俗，故先王著其教焉。”《乐记》是我国古代较早的系统音乐与音乐教育论著，对后世音乐发展方向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
《礼记》代表性的注疏有东汉郑玄《礼记注》、唐孔颖达《礼记正义》、清朱彬《礼记训纂》和孔希旦《礼记集解》等。点校本有中华书局1998年版《唐宋注疏十三经》本《礼记注疏》。

《左传》相传孔子根据鲁史修《春秋》，上起鲁隐公元年（公元前722年），下止鲁哀公十四年（公元前481年）。共计二百四十二

年。《春秋》文句简约，寓有褒贬。后人为理解其文意，于是出现了解释《春秋》的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春秋穀梁传》等三传。《春秋公羊传》与《春秋穀梁传》着重于阐述《春秋》的微言大义，对史实增补不多，史料价值不大。《左传》相传为春秋时期左丘明作，但近人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根据各国史料所编。《左传》上起鲁隐公元年，下止鲁悼公四年（公元前 464 年）比《春秋》多十七年。

《左传》在生动记述各主要诸侯国史实的同时，也涉及家庭教育、社会教化等内容。

在家庭教育方面，较著名的是《隐公三年》载，卫庄公宠姬的儿子公子州吁得到庄公的宠爱。公子州吁好武事，庄公不加禁止。石碏就劝告庄公道：“臣闻爱子，教之以义方，弗纳于邪。骄、奢、淫、佚，所自邪也。四者之来，宠禄过也。”《左传》所提出的教子义方的主张，在传统家庭教育中影响很大，成为两千多年来人们的教子共识。

在社会教化方面，《僖公二十七年》载，晋侯一回国就训练百姓，两年后就想派他们去打仗，子犯劝道：“民未知义，未安其居。”于是尽量便利百姓安居。晋侯又想使用百姓，子犯说：“民未知信，未宣其用。”就攻打原国来让百姓看到信用。人们做生意不求暴利，交易分明。晋侯问：“够了吗？”子犯说：“民未知礼，未生其共（共即恭，本书作者注）。”于是举行盛大阅兵仪式，让大家看到礼仪，建立执秩来规定官员职责，等百姓能听从指挥，明辨是非，然后才使用他们。结果一仗就帮助宋国解除楚国的包围，称霸诸侯。这是春秋时运用教育的手段达到强国目的的典型。

此外，《昭公七年》孟僖子临终仍学礼不辍，《昭公十八年》闵子马说“夫学殖也，不学将落”，《昭公二十六年》子产论礼的功用等，都是《左传》有关教育的名篇。

《左传》的通行本有西晋杜预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、唐孔颖达《春秋左传正义》、清洪亮吉《春秋左传诂》、徐仁甫著《左传疏证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。

《国语》二十一卷，相传是春秋时左丘明著，以记西周末年和春秋时鲁国贵族言论为主。《国语》不属《五经》范围内，但可以与《左传》相参证。《国语》有关教育的叙述与《左传》很接近，但在内容上似比《左传》更丰富些。

在家庭教育方面，《国语·鲁语下》有敬姜教子勤劳的著名故事。敬姜是鲁国执政季康子的从祖叔母。其子公父文伯退朝后去看望敬姜，见她在亲自纺织，便说：“凭我们这样的人家，主母还要纺织，恐怕季孙要发怒的，他会怪我不很好地服侍母亲吧。”敬姜便叹了口气，给他讲了“夫民劳则思，思则善心生；逸则淫，淫则忘善，忘善则恶心生”的道理，并举了古代从君主、王后到百姓人人勉力从事的例子。在《晋语五·靡笄之役》中，另有范武子教子谦虚谨慎的生动故事。

在贵族教育方面，《晋语四》载晋文公想请阳处父当太子的老师，询问胥臣的意见，胥臣回答说，这要看太子本人：“质将善而贤良赞之，则济可俟。若有违质，教将不入，其何善之为？”教育的效果要受到学生素质的限制。只有在一定素质条件下，教育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。在贵族教育的内容方面，《楚语上·申叔时论教》有一段较详细的叙述。当楚庄王向申叔时问起太子教育时，申叔时提出了九教：“教之春秋，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，以戒劝其心。教之世，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，以休惧其动。教之诗，而为之导广显德，以耀明其志。教之礼，使知上下之则。教之乐，以疏其秽而镇其浮。教之令，使访物官。教之语，使明其德，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。教之故志，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。教之训典，使知族类，行比义焉。”这九教以德育为主，并结合了诗、礼、历史、各国

史书“春秋”、本国先祖事迹“世”、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“语”、宗族（“训典”）等各方面知识，对太子进行全面的知识和素质培养。

《国语》的注本有三国韦昭注、清洪亮吉《国语韦昭注疏》、近人徐元诰《国语集解》（中华书局 2002 年版）。

三、诸子论著中的教育文献

先秦诸子之书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把它们分为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墨家、纵横家、杂家、农家、小说家，共九派。其中，儒、道、墨、法、杂家著作，保存了较多的教育思想文献。

1. 儒家著作

《论语》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汇编。孔子（前 551—前 479），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和教育家，儒家学说的创始人。《论语》是研究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教育活动与思想的最直接和可靠的资料。西汉时，有今文本《鲁论》二十篇、《齐论》二十二篇和古文本《古论》二十一篇，共三种。西汉末，安昌侯张禹据《鲁论》参考《齐论》编出定本，称《张侯论》。东汉郑玄以《张侯论》为本，参考《齐论》与《古论》而为之注，吏部尚书何晏又为之集解。今本《论语》二十篇，就是郑玄的注本。

由于是根据各弟子所记而汇编成书，全书为无系统的语录和记事体裁。据赵光贤《周代社会辨析》研究统计：“全书所搜集材料共有 509 条，有关教育的言行 371 条，内有孔子的教育言行 333 条。以此为据，我们完全有理由肯定，《论语》基本上是孔子和其门人的教育和教学实录。”

《论语》涉及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各方面，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儒家教育思想体系。包括以“仁”、“知”、“勇”为主的理想人格，

以培养能“弘道”的从政人才为主的教育目标，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。以下只注篇名）的人性论，在此基础上实行“有教无类”（《卫灵公》）的教育，以“文、行、忠、信”四教（《述而》）为主要教育内容，以仁和礼为核心的道德教育，形成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，等等。从而开创了我国传统教育的基本模式，深刻影响了此后整个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。

《论语》提出系统的儒家学习论，如注重求知欲和学习兴趣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（《雍也》）学贵有恒：“善人吾不可得而见之矣，得见有恒者斯可矣。”（《述而》）学贵博约：“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。”（《颜渊》）学贵求实：“子绝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”（《子罕》）学、思结合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（《为政》）学、习并重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（《学而》）学以致用：“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，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，虽多，亦奚以为？”（《子路》）

《论语》还以孔子的言行，展现他为人师表的风范。如：“默而识之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。”（《述而》）“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，欲罢不能。”（《子罕》）这些言行影响至为深远。

《论语》的注疏很多，最重要的有：《论语注疏》由三国何晏集解，宋邢昺疏。该书保存了宋理学家以前的经典注疏，有些是较原始的解释。有《十三经注疏》本朱熹《论语集注》。该书是宋理学家对《论语》的权威解释；清代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，以何晏集解为主，详采各家，并收集清人的研究成果；杨树达《论语疏证》，引用材料丰富；杨伯峻《论语译注》，有白话文翻译和注释，书后有“论语词典”按笔画排列《论语》本文的词，便于查找。

《孟子》七篇十四卷，孟子晚年与其弟子万章、公孙丑等人著。一说是孟子的弟子与再传弟子的记录。孟子（约前 372—前

289)，约生活于孔子去世后 150 年。当时奴隶制度已全面崩溃，封建制度已在各诸侯国建立，各国正通过兼并战争扩充自己的势力。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，同时贫富悬殊，“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殍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孟子继承孔子“仁”的思想，把它发展为“仁政”，主张力图劝说统治者实行仁政，放弃兼并战争，减轻对人民的压迫，发展农业。有关仁政的主张在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有详细的论述。《孟子》中的教育思想，也是为其仁政思想服务的。理解其仁政主张是理解其教育思想的钥匙。

《孟子》有关教育的思想，主要分布于以下各篇章：

性善论是孟子仁政的理论基础。在《公孙丑上》中，以“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”为证，说明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”，从而把孔子“性相近也”发展为性善论，把仁、义、礼、智的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生的和固有的，如同人有四肢一样。《告子上》进一步说明：“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故曰求则得之，舍则失之。”

以性善论为依据，孟子把孔子的内省修养发展为以“求放心”和“养浩然之气”为主的修养论。孟子的修养有一个显著特点，即强调自我扩充内心的“义”，通过集义养气、养心寡欲等途径把放失的仁性找回来，进一步把义与利对立起来，为此后儒家的义利观和修养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。有关修养论分布在《公孙丑上》、《离娄上》、《尽心上》、《尽心下》。

在教学方面，孟子积累了许多经验，提出“教亦多术”（《告子下》）的主张。在《尽心上》提出五种教学方法：“君子之所以教者五：有如时雨化者，有成德者，有达财者，有答问者，有私淑艾者。”在《告子下》中还有“大匠诲人必以规矩，学者亦必以规矩”的观点，以及《尽心上》有“君子引而不发，跃如也”的启发式教育思想。

在《离娄下》、《尽心上》等篇章中讲述了孟子深造自得和循序渐进的学习论。如“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则居之安，居之安则资之深，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。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”（《离娄下》），又如“其进者锐者，其退速”等等。

《孟子》有代表性的注疏有东汉赵岐《孟子注》这是较先前的《孟子》注本，北宋孙奭疏，《十三经注疏》就采用这个注疏，宋朱熹《孟子集注》是宋代理学家对《孟子》的权威注疏，戴震《孟子字义疏证》，则反映清代的研究成果，有何文光整理本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。

《荀子》二十卷三十二篇，战国时荀子（约前313—前230）著。其中《大略》、《宥座》等最后六篇或系其弟子所记。生活于战国末期的荀子，为适应社会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大趋势，根据儒家的基本观点，设计了“天下为一，诸侯为臣”（《儒效》）的大一统理想，并提出富和教结合的设想：“不富无以养民情，不教无以理民性。故家五亩宅，百亩田，务其业而勿夺其时，所以富之也。立大学，设庠序，修六礼，明七教，所以导之也。”（《大略》）为实现这一理想蓝图，“尚贤使能”是关键。在书中不少篇章如《王制》、《王霸》、《君子》等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点。而书中提出的理想人才，就是这种贤能之士，称之为“大儒”：“法先王，统礼义，以浅持博，以古持今，以一持万，……张法而度之，则掩然若合符节，是大儒也。”用大儒，“而后天下为一，诸侯为臣”（《儒效》），《荀子》中的教育思想也是为培养这样的贤能之士而提出的。其中，以下三点是荀子的主要教育主张，在先秦教育思想中也是很突出的：

其一 性恶论。在《性恶》详细论证“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伪也”的观点。该篇说：所谓性，是指天性：“天之就也，不可学，不可事。”所谓伪，指人为的事：“可学而能，可事而成之在人者，谓之伪。是性、伪之分也。”所以说人性恶，是因为人性生而好利，生而有耳